



巴望生病

■ 文/王克勤

作者自述

王克勤 丹阳人，中学语文教师，现退休闲居，养花、晒太阳、攒蛋、茗茶、饮酒而已。

小时候，我很巴望自己生病，因为一生病，就可以吃到父母亲手做的“药”了。

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饥饿。几乎从我记事起，就一直被饥饿所困扰折磨。天天食不果腹，肚子咕咕叫，家里一年到头，除了过年过节可以吃上一两块鱼肉之外，平时是闻不到荤腥味的。尽管父母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出工，鸡叫做到鬼叫，披星戴月，含辛茹苦，也无法让他们的孩子们吃饱饭，更不要说提供身体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睡到半夜饿醒了，很是难受，肚子里仿佛有一个空洞魔兽，欲吞进大量东西。我偷偷从床上爬起，鬼魅一般从黑地里摸到灶间，打开竹碗橱，想找点可填肚子的东西，手摸到之处不是空碗就是空碟，再摸到灶上，不是空锅，就是空盆。实在熬不过，只得从水缸里舀了一大勺冷水，咕咕地灌了一肚子。

那年秋天，不知怎的，由感冒引起的咳嗽拖了很长时间都没好，有时候咳到痰液带着鲜血吐出，感觉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，喉咙里仿佛有虫子爬，想不咳就是止不住。父母也急起来了。对于乡下的贫困家庭来说，伤风感冒等小毛病一般都采取自然疗法或土方疗法，极少找医生或去医院的。父母看我总不

好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急得团团转，商量着要带我去公社医院，却又犹豫。不知是哪位邻居向我父母提供了一个土方子。

母亲先是从东家讨了一点豆油，西邻要了一点冰糖，又从隔壁借了几个鸡蛋，准备晚上为我做治咳嗽的药。月上柳梢，鸟栖枝丫，虫鸣壁间，乡村的夜异常静谧。父亲在大队部开完会，披着星月，乘着晚风回到了家。弟妹们都睡了，我还咳着。母亲守着我在油灯下做针线——纳鞋底。父亲过来看我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判断说：“好在没发烧。”

他从门外一手拿了一块土塍（乡下用来砌房子的土坯），横架在灶壁脚，然后把鸡蛋、豆油、冰糖等一并拿过来放在手边，随手从灶上取了木柄铜勺，将豆油倒在铜勺里，再把铜勺放在两块土塍上，木柄靠着灶壁。父亲蹲着从旁边抓了一把麦草，弓着腰用火柴点燃麦草，送到了两块横立着的土塍间铜勺之下。顿时，红红的火舌舔着铜勺，也把父亲削削清瘦惨白的脸映红了，父亲躬身弯腰做“药”的身影清晰地映在斑驳灰暗的墙上。一会儿，豆油沸腾起来了，父亲趁势将鸡蛋磕破流入铜勺，紧接着又把冰糖放入蛋液，然后一手扶着铜勺柄，一手用筷子在铜勺里搅拌，一边添柴续火。

不一会儿，甜味满屋，油香扑鼻，黄白相间的鸡蛋在铜勺里啦啦啦啦地欢唱着。我看着色泽鲜润，质感柔嫩的“药”，连口水都掉下来了。父亲拿着滚烫的“药”递给我，说：“小心，慢点，不要烫着嘴。”甜滋滋、油腻腻的金黄鸡蛋块粒欢快地跳进了我的嘴里，溜到了喉间，滑向了肚里。啊，这哪里是药，这分明就是世上从未有过的美味佳肴啊！我从来没有如此品尝过，从来没有如此满足过，从来没有如此幸福过！我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在争着分享这美味佳肴，那种甜蜜的感觉就像一股洪流把我整个淹没了！父亲看着喜悦兴奋的我，脸上露出了平时很难看到的的笑容。“快点睡吧，咳嗽很快就会好的。”他和蔼地宽慰我，又摸了摸我的额头，就去收拾“药”场了。果不其然，父亲连续为我做了两三次豆油冰糖煎鸡蛋，我的咳嗽居然就好了。病是好了，可是却意味着再也吃不到那美味佳肴般的“药”了，多么让人遗憾！

从此以后，只要我和弟妹们感冒咳嗽，父亲就给我们做豆油冰糖煎鸡蛋的“药”，而且一吃就好，太神奇了！以至于每当我饥肠辘辘，饿得头晕目眩时，就巴望着自己生一场病，巴望着咳嗽不止，巴望着吃到父亲亲手做的“药”！

评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

■ 文/秦安国

作者自述

秦安国 中国自然资源作协会员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。

路遥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以20世纪80年代陕北地区城乡生活为背景，通过农村青年高加林高考失利后回到农村作为叙述线索，以第三人称视角注入作家自身的情感认知，反映高加林在追逐梦想、自由恋爱的道路上遭遇的生存困境，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“集体镜像”，被无数读者誉为“人生答案之书”。由阎建钢执导的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取材该小说，保留了小说文本的精神内核，还原了当年陕北大地真实生活，对小说的叙事主体、故事情节、社会功能意义等进行了合理改编，成功阐述了陕北农村青年实现自身价值的奋斗历程，符合新时代文艺作品凝心聚力、提振精神、成风化人的主流价值取向。

在路遥的小说《人生》中，文本开头描写道：“陕北的黄土地苍茫冷峻，也孕育着神奇的生机。”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，农村知识青年考上大学便可以改变“面朝黄土”的命运。高加林是村里人人皆知的读书料子，虽家境贫寒，但他志向远大，发誓要走出黄土地。在高考失利之后，他历经大起大落，饱受精神摧残，最终回到孕育他的陕北大地。高加林的父母认为，人要认命，做一个农民，有吃有喝，结婚生娃，便是履行了人生的义务。面临改革开放大潮，千千万万的农村知识分子的出路最终在哪里，路遥把这个问题留给了时代和读者。

柳青曾在《创业史》中告诉人们：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

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在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中，对小说文本的“留白”进行了艺术再造，以叙事扩容的方式，续写高加林离开陕北黄土地、奔赴上海之后的成长经历，对受众的审美空间进行外延，试图将文学思维转化为视听思维，形成同频共振的艺术呈现形式。高家村作为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，村民有一个“上海梦”，去上海工作成为出人头地的目标。上世纪80年代正值社会转型，城市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，而陕北黄土地发展则相对滞后。剧中通过镜头切换，陕北和上海两个不同的时空，一个代表偏远农村镜像，一个代表现代都市镜像，渗透着城乡对立矛盾和融合发展的关系。

在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中，高加林在遭遇高考被人冒名顶替、民办教师辞退、通讯组工作被恶意举报等挫折后，高加林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是否留在黄土地当一辈子农民？高加林的经历，可以说是每个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必经考验，他遇到很多正能量的贵人。例如景老师、村民德顺爷、好友陈方明、报社林主编，他们赏识高加林身上的“闪光点”，在最关键的时候施以援手。高加林始终没有放弃梦想，凭借出色的文笔，考到上海报社工作，开启了“正大光明”式的自我逐梦之路，最终实现“陕北农民—著名作家”的身份置换。

在追求人生梦想的同时，高加林也面临了关于情感问题的抉择。

影视作品中的情感冲突矛盾性往往让观众回味无穷，“事业+爱情”两条主线交叉呼应，推动整个剧情碰撞跌宕，拓展了故事的外延力度。剧中刘巧珍是一个“金子般”的人，虽然没文化，却乐观豁达、吃苦耐劳，凭着双手勤劳致富。与传统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迥异，她不介意村民的传统世俗眼光，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情感需求，主动追求高加林，愿意在家相夫教子，全力支持高加林追求梦想。

面对农村姑娘刘巧珍和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，高加林摇摆不定，最终为了更好的前程选择黄亚萍。村里的孩子唱起了信天游——哥哥你不成材，卖了良心才回来……所有的村民都谴责负心汉高加林，而巧珍始终不记恨高加林，依然处处为高加林的未来越着想，展现了淳朴善良的美好形象。而黄亚萍最终去美国母亲处，追逐舞蹈家的梦想，与高加林分道扬镳。刘巧珍将高加林送给她的“红色纱巾”放飞于陕北高原，摆脱了感性层面的痛楚，以独立觉醒的姿态宣告新的人生，接受了深爱她的村民马栓的求婚。

导演阎建钢说：“改编之后的《人生之路》已远远超越原本时空的界定，一直把故事空间延展到了今天。”文艺作品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。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以特定时代个体的奋斗史观照社会现实，折射出新时代潮流下，青年知识分子努力奋进的姿态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胡骏
校对 小伟